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三辑

商务印书馆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三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XIÀNDÀI GUÓWÀI JINGJIXUÉ LÚNWÉN XUǎ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三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295-8/F·18

1992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0 千

印数 0—2 0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3.30 元

出版说明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范例。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决定》在理论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及要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的确，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需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以便使理论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这就势必要打破许多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并根据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阐明。与此同时，我们也还须打开眼界来了解国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并批判其错误的论点。为满足后者的需要，我们特选译了二十二篇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分成两辑出版。绝大多数执笔者都是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编入本辑的论文有：

A·伯格森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虽然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较早（1948—1949年），但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者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经典作品。作者针对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所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运转以及如何运转得好的争论，试图解说

在这场争论中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作者对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有效率这个争论问题,提出了三点告诫:(1)要在比较效率上得出任何结论,必须在效率的检验标准上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说,必须在资源最优配置所由以规定的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2)必须区分在假设世界中运转的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在现实世界中运转的相互对立的经济体制。即,必须把理想同理想相比较,或者把事实同事实相比较,否则,任何比较都是毫无意义的。(3)在现实世界中比较效率的问题不能完全与政治问题分离。伯格森的这些意见,对于我们比较研究各种经济模式有参考价值。

阿瑟·迪夸特罗的《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指出,市场机制的利用与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则是不相矛盾的。作为一种分配手段的市场,既不需要资产阶级性质的物质刺激,也不需要它造成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上的根本不平等。市场对效率的强调不必导致工厂的独裁组织、劳动的分裂、或异化劳动的任何其他表现。市场社会主义获得市场的好处,而去掉它的资本主义的短处。作者的这些观点可供我们研究如何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时参考。

德鲁·巴登的《最优计划》一文,集中评论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利用最优化方法来制定和执行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这两者间的关系。作者问道:“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须是社会生产关系稳定的改变,幻想把决策权下放给以价格指导的竞争规则为基础的外部机构,这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系吗?看来必须认识到,四百多年来,竞争行为、商品生产和利润动机的产生已经创造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个人。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整个阶段中,这种相似的个人物质刺激和最优计划的广泛使用怎么能够产生社会主义个人必须具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呢?”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有进一步研究

的必要。

赫维茨的《经济体系中的集中化与分散化》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关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实施限制的论战以及19世纪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与合意性的争论。但作者认为，那些讨论都集中于概念而非分散化的程度，如所有制（私人的或集体的），收入决定，以及“价值”的作用。后一个问题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最优资源配置。因此，作者就竞争均衡的最优性质，数学公式和机制，信息的离散，竞争过程中的交流，行为准则，帕累托满足，马林沃德准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提出的分析意见可供我们研究参考。

理查德·波特斯的《计划理论：分权的计划程序与集中的计划经济》一文讨论了分权计划程序对于中央计划经济运行的意义。作者提出，把分权计划程序作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的一种工具；应该寻求这样的分权计划程序——采用不同的、适用于不同单位特点的方式，特别要考虑到规模收益、外部情况、外贸依赖程度以及这个单位与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作者的这些看法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保罗·哈里的《利用投入产出和物资平衡体系的总量计划》一文，首先概括了投入产出和物资平衡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基本差别，然后按照投入产出和物资平衡原则，归并出一个基本的总量分解的生产模型。他将完全归并的不同条件应用于两种场合。当归并是不完全时，计算出归并误差的上限，并举出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别。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投入产出分析的实情并不像计划文献中所经常暗示的那样清楚明白。作者的这个看法可供我们研究。

阿曼·泽曼尼安的《计划经济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合作农场和个体农业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一文，采用与边际主义

方法相反的行为主义方法来分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怎样从动态上调整他们的劳动在农庄(或农场)与个人的小块土地之间的分配;然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种假设的情况,即农场(或农庄)是国营农场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一种合作投机事业,农场(或农庄)的劳动者可以决定全部在个人小块土地上或农场(农庄)土地上劳动,或者以某种方式在这两方面经营之间来分配他们的劳动。参考作者的构思和分析方法是有趣味的。

马克·哈里逊的《苏联原始积累的过程》,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什么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苏联原始积累的道路等问题。如何评论作者的一些观点,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阿尔贝托·基洛西的《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下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试图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以理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下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作者提出的一些分析性意见可供我们参考。

A.伯格森的《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技术选择》和刘兆南的《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营目标和均衡产量》都是有独立见解的文章,值得一读。

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始终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出版本辑《论文选》正是为我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目 录

社会主义经济学	A. 伯格森 (1)
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	阿瑟·迪夸特罗 (43)
最优计划: 一个激进派的评论	德鲁·巴登 (65)
经济体系中的集中化与分散化 论信息分散	
的概念和可能性	里昂尼德·赫维茨 (86)
计划理论: 分权的计划程序与集中的计划经	
济	理查德·D. 波特斯 (104)
利用投入产出和物资平衡体系的总量计划	
.....	保罗·G. 哈里 (114)
计划经济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合作农场	
和个体农业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	
.....	阿曼·H. 泽曼尼安 (136)
苏联原始积累的过程: 难于解决的问题	马克·哈里逊 (164)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下收入分配的分析框	
架	阿尔贝托·基洛西 (183)
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技术选择	A. 伯格森 (198)
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营目标和均衡产量	刘兆南 (223)
译名对照表	(233)

社会主义经济学

A. 伯格森

在这篇述评中，所关注的是近来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以及在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范围内，在福利经济学同类领域中的探究。从一种观点看，这些显然是抽象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为追求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合理化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当然，这里指的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未达到无限丰裕的阶段，换句话说，像它的资本主义前身那样，它仍然面临着在各种可选择的用途中配置稀缺资源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委员会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它的任务都是尽可能切实可行地保证可利用资源得到最优利用。这里我们主要是扼要地评价对解决委员会的上述任务所已作出的贡献。

应该考虑的研究之一是，近来在最初是由米塞斯的著名文章^①引起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运转以及如何运转得好的争论中所取得的成就。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米塞斯本人提出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至少按照对它的一种解释是这样。这里，我们将试图理解在这场争论中什么问题已经解决而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

遗憾的是，看来不可能涉及近来在另一个即关于社会主义下计划和自由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更大的论战中所取得的成就。鉴于俄国革命发生的特殊环境，这个国家在计划与自由问题上的经

^①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社会科学文献汇编》，1920年3月，第XLVII期，第86—121页。它的译文载于F.A.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制度的计划》（伦敦，1935年），这篇述评参考了这个译文。

验也许不像人们有时想像的那样是带有结论性的。也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批评者近来强调这个问题有时显得是一种策略手段,以支持论证米塞斯的理论不足以成立的一个理由。但围绕计划和自由问题进行的争论却的确必须给予最认真的考虑,不考虑它们,人们就显然不可能发现社会主义的平衡。

I. 目标

这里所评述的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定义是明确的)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样一个大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的著作多年前都已出版了。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帕累托^①和巴伦^②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马歇尔^③和庇古^④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中的著作。这些研究为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所有实质性的东西。在更近期的研究中,大量的是在阐明和发挥这种分析。

马歇尔,庇古,帕累托和巴伦论“目标”

最优配置的定义首先涉及到价值尺度的公式,这个公式是评价资源的可选择用途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这个价值尺度可以被认为是体现了中央计划委员会所服务的目标。为了描述近来对这方面分析的教条的发展,有必要简要地谈谈上面提到的基本著作中的公式。

① V.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II 卷(洛桑 1897 年),第 90 页及以下,第 364 页及以下。

② E. 巴伦:《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杂志》,1908 年 9 月和 10 月,第 2 辑,第 XXXVII 卷,第 267—293 页,第 391—414 页。译文以“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的标题在哈耶克编的上引书中发表,本文参考了这篇译文。

③ A.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 1 版(伦敦,1890 年);第 8 版(伦敦,1920 年)。

④ A. C. 庇古:《福利经济学》,第 1 版(伦敦,1920 年);第 4 版(伦敦,1934 年)。

就马歇尔和庇古来说，必需的价值尺度是直接从他们的众所周知的“福利”概念产生的，这一概念是指一个社会中各个家庭效用的总和^①。他们假定当收入相等时，对敏感程度相等的不同个人来说，其收入的边际效用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那种使福利最大化的配置。很明显，达到这种最优的一个条件是：收入必须相等。

就帕累托和巴伦来说，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较为复杂一些：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要增进一个家庭的福利而不减少另一个家庭的福利是不可能的。^②假设有一种重新配置可能导致这种结果，那么按照推论，社会的资源就能够依此得到更有利的利用，而在最优配置状况下，这种机会早已应该被完全利用了。

在帕累托那里，这个公式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无需假定（像马歇尔所做的那样）福利是各个家庭效用的总和而能够定义资源的最优配置。帕累托以不同家庭的效用是不能用同一单位计量的为理由，认为上述假定是要不得的：

（我们既不能比较它们也不能计算它们的总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借以表达出来的那些单位之间的关系。）

正如帕累托和巴伦所承认的，他们的公式为最优配置的定义提供了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标准。问题仍然是，如何在那些使一些家庭境况变好而另一些家庭境况变坏也就是有收入再分配发生的不同配置中进行抉择。帕累托靠假定收入“依照它所喜欢采取的原则”进行分配而简单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类似地，巴伦假定收入分配是建立在一些“伦理标准”基础之上的。

① 关于马歇尔和庇古著作中有关章节的介绍，见A. 伯格森：《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表述》，《经济学季刊》1938年2月，第LX卷，第310—334页。

② 参见同上。这是帕累托引入的一个数学标准的语言表述。正如作者在刚才引用的文章中指出的，帕累托自己曲解了他的标准，这里正确的解释是由巴伦作出的。

可选择的目标

关于目标的最近的教条发展之一是引入了马歇尔、庇古、帕累托和巴伦的价值尺度的变形的分析。所有这些作者显然考虑这种情形：资源的可选择用途的评价是以各个家庭的偏好为基础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家庭的偏好是要算进来的。假如这样一个价值尺度被实施，消费者就是“独立自主的”。他们的兴趣集中在这种情况的各种变形上，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自己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确定什么对消费者是好的并在此基础上配置资源时，变形问题就产生了。

对这种变形的考虑的一个重要先例是庇古的一个著名论点，即消费者在决定储蓄上不能正确权衡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作为远视官能的结果，与相等程度的现在的满足相比较，他们倾向于低估将来的满足。接踵而来的是，假如在储蓄和投资上消费者是独立自主的，那么总储蓄就会少于社会所想要的量。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一个漠视消费者偏好的理由。

这个特殊的论点近来已被推广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因此，多布^①现在认为，社会主义的委员会在储蓄上必须不理睬消费者偏好，而是奉行同等地评价与现在的满足相等的将来的满足的原则。兰格^②采用了同一假设。

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像我们理解它的那样，在收入是不变的条件下，委员会将同等地评价现在与将来收入的一个边际“美元”。

① M. 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纽约，1940年），第298—299页，第311—312页。

②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载B. 利平科特编辑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1938年）第90页及以下。这是两篇文章的修订本。这两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经济学研究评论》，1936年10月和1937年2月，第IV期，第53—71页，第123—142页。除另外说明的外，本文参考的是这个修订本。

在收入被预期作为已进行的投资的结果而增长的情况下，对将来的这个边际美元的评价仍然应该低于现在。这是各个收入时期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和庇古提到的远视官能毫无关系。因此，在决定投资数量上委员会应在两种相反的考虑中采取一种平衡：一方面是刚才提到的事实，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一个边际美元在将来所值要比在现在少；另一方面是这样的事实，作为迂回过程的预想的更大的生产率的结果，现在投资一个边际美元将得到一个贴水。

多布^①设想在社会主义下对于消费者主权原则将会有许多其它的例外。他认为，除了储蓄问题外，消费者在其它许多决定上也或多或少是不合理的。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例如教育和保健事业），即使消费者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进行合理的选择，他的决定也会与社会利益不符。在这方面，多布还谈到这样一些货物（例如警察保护），这些货物按其本性是不可能根据各个家庭的偏好在它们之间配置的。^②

① 上引书，第309页以下。亦见同上，《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经济学季刊》1933年12月，第XLII期，第588—598页。

② 多布称之为表明需要背离消费者主权的另一种情形需要特别评论。这种情形就是单个消费者对一个东西的欲望依赖于其他人占有还是不占有它的事实。“摆阔性的挥霍浪费”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人所熟知的例子。

正像保罗·萨缪尔森注意到的（《经济分析原理》[剑桥，马萨诸塞，1947年]第224页），福利分析——像它通常被阐述的那样——假定个人偏好仅仅依赖于他消费的货物的数量而不依赖于被其他人消费的数量。至于“摆阔性的挥霍浪费”人们必须重新陈述消费者主权原则以使任何家庭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它所消费的货物的数量而且也依赖于由其它家庭消费的数量。

委员会也许认为，像多布暗示的，因为他们的“习俗的”特性，消费者主权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被否定。假如委员会这样做，确实会有对消费者主权原则的背离。

但更有趣的也许是多布没有说出的这个事实：即使委员会决定坚持消费者主权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这时不同家庭的爱好是互相依赖的）实际上贯彻这一原则也会有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一点能被证明：在消费者把价格作为一个参数的自由市场上（参见第II节中关于消费者主权和自由选择的区别的讨论），在消费者之间的货物的分配决不能达到最优。假如能够设置一个有效的以货易货的市场，消费者相互间能够进行贸

假如消费者货物普遍地被纳入自由市场，那就意味着前面的考虑所包括的那些商品应该用“社会服务”的形式进行公共分配。应该用上述方式进行分配的这类商品的问题，也已由迪金森进行了讨论。^①

福利函数

主要是由现在的作者^②取得的另一个新的进展是，阐明目标决定的数量和性质问题，这个目标被要求用来表示必需的价值尺度。在已被引用的各种著作包括旧作和新作中，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的。

从马歇尔和庇古及其使用效用计算的现代的追随者的公式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实际上，它们只涉及了使“福利”最大化的决定。一旦作出了这个决定，所有其它问题看起来就都被确定了，这就是说，剩下要做的只是依据经验调查，确定消费者是否准确地评价将来的满足，他们在这个或那个选择中是否“合理”，他们是否是同等地“敏感”，以及假如不是这样，他们的“敏感性”是如何的不同等等。

显然，无论如何这种含意是相当令人吃惊的，马歇尔和庇古的追随者对其正确性感到怀疑是不奇怪的。当多布^③以及在他之后

易，那么看起来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最优境界。单个家庭在前一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将漠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物物交换）则会重视其它家庭消费方式的变化对它的福利的影响，这种变化可以由它自己的选择引起。

萨缪尔森关于上述问题的著作到我们手里太晚了，以致在这篇文章中不能给以充分的考虑。在许多点上，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关于福利分析的、比迄今为止已作出的阐述都要精确的阐述。

① H. D. 迪金森：《社会主义经济学》（牛津，1939）第 51 页以下。

② A. 伯格森，上引书。同时参见 O. 兰格《福利经济学原理》，《经济计量学》1942 年 8—10 月，第 X 期，第 215—218 页。

③ 《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引书，第 594 页。

的卡恩^①怀疑正被最大化的福利也许完全是“主观的”(就像“一间黑屋子里的一只黑猫”的说法一样)时,他们希望表达的也正是我提到的这一点。

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帕累托和巴伦明确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必须是目标决定的主题。鉴于他们在消费者主权问题上的沉默,人们不可避免地想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近来靠使用帕累托—巴伦公式来建立在某种意义上是“实证的”或“科学的”福利原则的努力,例如希克斯的努力,^②只是加强了这一点的不确定性。根据其含意,这些原则的产生不要求在目标上作出任何决定。

在处理整个这一问题时,现在的作者发现把福利函数引入分析是有用的,福利函数(W)的价值被理解为依赖于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影响福利的变量:每个家庭所消费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每个家庭所完成的每一种服务的数量,每一种资本投资的数量等等。福利函数最初被理解为具有完全普遍的性质:它的具体形式是由被引入分析的关于目标的具体的决定所确定的。给定了目标的决定,福利函数就被转变为评价资源可选择用途的价值尺度。

在已被论证的这个基础上,关于目标的下列问题的决定是被包括在已略述过的福利公式中的:

(a) 消费者主权。在作者看来,消费者是否独立自主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个这样的决定或一些这种决定的综合。要是认为“福利”就意味着消费者是独立自主的,那么在确定使福利最大化时,这个问题当然就已经被决定了。但是很明显,靠这种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在从事的含蓄的推理,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也得不到的。无论是通过定义还是通过别的什

① R. F. 卡恩:《关于理想产量的一些评论》,《经济学杂志》,1935年3月,第XIV期,第1—35页。

② J. R. 希克斯:《福利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杂志》1939年12月,第XLIX期,第696—712页。

么,目标的决定必须引入。此外,这一点看起来是清楚的,在消费者的“合理”和他们评价将来满足的准确性等问题上意见的不同,常常将变为道德标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能为经验调查所消除的程度是一个哲学家们自己也有不同意见的问题。

假如目标决定是支持消费者主权的,那么福利函数可以表达成下述形式:

$$(1) W = F(u^1, u^2, u^3, \dots).$$

这里, u^1, u^2, u^3 等等表示各个家庭的效用, W 表示社会福利,它被理解为这些效用的增函数。因此,社会福利是不变的还是增加或减少的,取决于各个家庭的效用是不变的还是增加的或减少的。假如目标决定是反对消费者主权的,那么,福利函数就会表示为另外一个公式,在这个公式中委员会自己的偏好尺度被用来代替各个家庭的效用函数。

显然,公式(1)完全是马歇尔—庇古公式的推广,按照后一公式, W 是效用 u^1, u^2, u^3 等等的总和。同样明显的是,使 W 最大化将会满足帕累托和巴伦的标准。的确,这个函数可以视作对他们的标准中所隐含的价值尺度的明确的公式表达。

(b) 收入分配。作者追随帕累托认为效用是不可用同一单位计量的,^①并且赞同罗宾斯^②的意见,认为由于上述之点,无论是按逻辑法则还是按照经验证明,都不可能从效用计算中推论出收入分配的原则。那种关于必须“假设”效用的可比性以建立标准规则的基础的熟悉的呼吁(勒纳^③和兰格^④现在也参加了这种呼吁),在

① 它们的不可比性反映在效用的经验测量中的一维常数的现象上。

② L. H.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2版(伦敦,1935年),第VI章;同著者:《效用的人际比较》,《经济杂志》,1938年12月,第XLVIII期,第635—641页。后一篇文章是答复R. F. 哈罗德的《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的,该文载《经济杂志》,1938年9月,第XLVIII期,第384—412页。

③ A. P. 勒纳:《控制经济学》,(纽约,1944年),第24—25页。

④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100页,注54。

我们看来是不符合这一论点的。

但是所有说的这些一点也没有超出目标决定所涉及的范围。正像作者所看待的那样,目标是对各种选择进行评价的基本原则,而各种选择除了评价是不可比较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评价。一旦作出一个评价,选择就是真正可比较的。给定收入分配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在分配被实现时,按照这个原则,每“美元”的边际福利对于不同的家庭必然是一样的。

(C) 不同家庭福利的相互关系。由于马歇尔和庇古设想福利是不同家庭的效用的总和,他们的公式包含了一个关于目标的附加决定,即不同家庭效用的相互关系的社会价值为零。由任何一个家庭的预算状况变化所引起的社会福利的变化量丝毫不依赖于其它家庭享受的生活水平。

为了分析最优配置,没有必要提到这种特殊的和显然是很含糊的情况;已经证明,所有重要的命题都能从上面给出的公式中的更一般的函数中推论出来。这一点的证明似乎是由于把福利函数引入分析所产生的一个更有趣的教条的收获。

帕累托对马歇尔—庇古公式的批评遗漏了这一点。从一种纯粹形式的观点看,对马歇尔—庇古公式的异议不是说(像帕累托所暗示的)他们把不可比的效用相加,而是说这些效用的总合包含着一个多余的而且的确是可疑的假设。^①

在所考察的这些著作中,消费者主权原则通常被解释为不但是在消费者货物上而且也是在工作上存在着家庭偏好。因此,公式中的效用函数应被视为代表不同家庭的从消费中产生的效用和

^① 正如萨缪尔森弄清的,关于各个家庭的分配对总福利的独立性的假设不同于关于不同家庭的爱好结构的独立性的假设,并且是后一个假设的补充。后一个假设在上面的注中提到过。在后一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其全部含意是各个家庭的边际替代率仅仅依赖于它消费的货物的数量,而根本不依赖于其它家庭消费的数量;同时完全可以相信这个条件也会得到公认,即一个家庭的总效用受其它家庭生活水平的总的变化的影响。